

史》等等，都堪稱體系化的理論名著。從這個角度上說，蕭先生算得上是學院型知識份子。但是，在《憲政與民主》一書中，他似乎又變成了一個策論型的知識份子，他關注現實，評析政治，回應時論，提出方案，表達憂患，勸告他人，幾乎扮演了賈誼曾經充當過的角色。

不過，二十世紀的蕭公權畢竟不同於漢代的賈誼，他與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一方面，賈誼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大漢帝國的君主；蕭先生立言的着眼點，主要在於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主要在於尋求中國政治優化的對策與方案。另一方面，蕭先生的知識背景也不同於賈誼。他自幼研經讀史，打下了甚為堅實的國學基礎；稍長始習英文，勤勉自勵，盡窺門徑；後又就讀於密蘇里大學和康奈爾大學。蕭先生在學貫中西、調和新舊的同時，也

培養了兩種可貴的品質：關心國事的熱心與深思熟慮的理性。如果說，前者主要繼承了中國文化裏「士」的傳統，表達了蕭先生對於「善」的渴望；那麼，後者主要沿襲了西方文化中「知識份子」的本性，體現了蕭先生對於「真」的追求。這兩種相互補充的品性，在《憲政與民主》的各篇文字中，幾乎隨處可見。

一個政治學家的熱心與理性，澆鑄了《憲政與民主》。從這個角度上說，蕭先生的《憲政與民主》一書，既有「熱透紙背」的熱心腸，也有「力透紙背」的冷思考；既包含了真摯的情感，又不乏理性的思想。人們熟悉的格言是：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然而，透過《憲政與民主》，我們可以發現，灰色的、理性的理論也可以呈現出常青的、溫熱的生命形態。

## 主義·話語·革命

### ● 張在興、陳偉



德里克 (Arif Dirlik) 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在傳統的研究視野中，無政府主義一直給人一種烏托邦的感覺，其提出的問題是理想化的，在實際運行上存在很大困難。但當我們把無政府主義思潮納入思想領域，和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最初經由巴黎和東京兩個較大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傳播進入中國，尤其受當時無政府主義大師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影響，而中國當時正面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大變局。

在一種批判的視角下進行檢討時，其實無政府主義蘊藏着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德里克 (Arif Dirlik) 的《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就是對這種資源的深刻挖掘。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最初經由巴黎和東京兩個較大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傳播進入中國，尤其受當時無政府主義大師巴枯寧 (Mikhail A. Bakunin) 和克魯泡特金 (Petr A. Kropotkin) 的影響，而中國社會當時正面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大變局。這時候無政府主義思潮首先面臨的就是本土化問題，即這種非中國傳統資源中的東西，如何適應或者說如何在中國大地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歷史向我們證明，西方的無政府主義與中國的傳統資源中大同世界理想化的追求有着強有力的接合點。而且，在當時的大變革年代，無政府主義像一個巨大的磁場，吸引着各個方面的主義和話語，無政府主義的複雜性此時得以彰顯。

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帶有強烈政治性的社會思潮，必然與當時的政黨 (國民黨、共產黨等)、重大事件 (如五四運動、十月革命等) 以及其他主義思潮 (烏托邦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三民主義等) 發生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些關係是如何發生的？無政府主義在其中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及今天研究無政府主義有甚麼價值？

筆者認為，德里克在以無政府主義的興起、發展和衰落為主體線

索的同時，緊緊抓住了幾個關鍵詞，並全面回答了上述問題。在本書中，作者使用頻率最高的是「主義」、「話語」和「革命」等詞，而這幾個關鍵詞也代表了當時社會語境的核心內容，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三大詞彙恰當地對應了思潮、表達和實踐，而在革命年代思想的實踐性又是重中之重。同時，作者明確指出，「我對無政府主義的評價是與那些否定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革命話語中的作用的中國人相反的。」(頁7) 這就是說，作者研究無政府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充分展示無政府主義的價值所在，而不是批判它幼稚的幻想或各種脫離現實的主張。在這點上，有的學者批評他的這種做法有「展示無政府主義的某些先見之明」(顧昕：〈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開放時代》，1999年第2期，頁29)之嫌，但在具體論述過程中，本書所採用的翔實資料闡述了無政府主義的價值。德里克看到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純粹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恆久衝擊力，也可以說無政府主義的缺憾帶來了自身一定的價值。尤其對於一個尋求政治民主化建設的民族來說，這種歷史資源還是有益的。

無政府主義在其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先後遭遇到各種主義的挑戰，比較典型的如社會主義、文化激進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三民主義等。1919年前後，中國社會上逐漸湧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德里克認為，無政府主義思潮是當時最流行和最具影響力的，這通過全國範圍內無政府主義團體的迅速

增加和無政府主義對非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滲透得到證明。在書中，作者通過對劉師復與江亢虎論爭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結論：無政府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如果要實現其目標，中國不僅需要一場政治革命，社會自身也必須發生重大變化，但在如何實現這一點上，他們卻有分歧。無政府主義者提倡的是一種自發的、能夠消滅一切現存制度的革命，具有強烈的徹底性；而江亢虎、孫中山等所主張的是一種以消滅革命的直接對立面（尤其是政治上與軍事上）為目標的革命，主張革命的最後階段用相應的政策來調和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並不完全否定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思想。他們的這種主張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在文化激進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其代表性人物多數都經歷過一個思考無政府主義的階段，尤其是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勞工結合理論，給激進主義者以巨大的啟發。即作者所提到的「工讀互助活動最重要的價值可能是引起了後來成為共產黨領袖的激進派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頁183）這些領袖包括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恽代英、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社會革命問題上，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最大區別在於，無政府主義將教育和文化革命放在首位，而馬克思主義把社會結構關係放在第一位。當馬克思主義於20年代後在中國佔據了領導地位，並且佔領了原來無政府主義曾經居主導地位的領域後，這

時的無政府主義逐漸被迫轉向了三民主義的領域。

三民主義由於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李石曾、吳稚暉等主張加入國民黨，同共產黨進行鬥爭。作者認為，這種加入是有條件的，即所謂「以三民主義為手段，以無政府主義為目標」（頁248）；他們根據自己的目標來解釋三民主義。而兩者的矛盾對無政府主義來說也是致命性的，無政府主義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事實：對三民主義的改造同樣可能造成國民黨組織思想對無政府主義的解構，無政府主義缺乏組織力量，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必然迎合了某些國民黨統治者的口味。這兩者之間的重要矛盾最終導致了無政府主義自己的分裂，無政府主義接着被國民黨政府鎮壓的命運也就在所難免。從此歷程看，無政府主義最終以悲劇性的色彩告終，但它同諸多主義的相互關係以及發生關係的過程，遠遠要比這種悲劇性的結果來得重要。

如果說主義是一種指導思想的話，那麼話語則是一種宣傳策略，革命則是具體實踐。作者認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特點是，它早早地與中國革命左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構成了革命派的話語體系，這也是無政府主義的表達中介和價值所在，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無政府主義能夠超越激進派之間的思想界限進行傳播。無政府主義提出了關於意識形態的一些本質問題，意識形態的運用過程是與革命中的文化霸權相關聯的，而革命霸權的取得或者說是對意識形態的廢

作者使用頻率最高的是「主義」、「話語」和「革命」等詞，恰當地對應了思潮、表達和實踐，而在革命年代思想的實踐性又是重中之重。作者研究無政府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充分展示無政府主義的價值所在，而不是批判它幼稚的幻想或各種脫離現實的主張。

如果說主義是一種指導思想的話，那麼話語則是一種宣傳策略，革命則是具體實踐。作者認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特點是，它早早地與中國革命左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構成了革命派的話語體系，這也是無政府主義的表達中介和價值所在。

除，這本身就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建立過程。如果這樣的話，對意識形態的廢除還有甚麼意義？革命的目標不是要創造一種新的、延續着社會分裂和衝突的霸權，而是完全消除霸權，同時革命不僅僅為了解放，它在消除社會話語中意識形態因素的過程中，也要為在一個新的平等基礎上人的合作創造條件。可見，無政府主義所提出的一些主張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但作者指出在實際革命運行中，無政府主義表現出強烈的機會主義傾向，他們不僅試圖使革命概念適應中國革命的迫切需要，甚至為此放棄革命的前提。

一些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關鍵人物同時也是政黨，特別是國民黨的成員，在實踐中背叛了他們在形式上對政治的否定；更糟糕的是，他們竟願意把無政府主義變成為政治權力服務的工具。

革命在無政府主義思想體系佔有重要地位。在無政府主義眼中真正的革命只能是社會革命，其突出特徵為堅持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的不可分離性。作者認為，無政府主義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他們率先在中國革命話語中舉起了文化革命的大旗，並對這種話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革命中無政府主義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作用，教育可以讓自然人變成完人，即一種知識與勞動的完美結合，這也是為甚麼無政府主義者能夠與國民黨政府合作建立勞動大學的原因。這樣才能實現社會革命的目標，即消滅一切舊的、非理性的、有害的，

因而不適於存在的；創造一個新的、理性的、有利於人的存在的社會組織。

革命是實現目標的最重要實踐，但就是在如何實踐上，無政府主義陷入了分裂的漩渦。尤其在同共產主義者的論爭中，無政府主義者愈來愈注重組織、革命策略和如何保衛革命等一系列問題。與國民黨進行合作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但這種合作本身是與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相背離的，因為真正的無政府主義是反對與任何帶有政治性的團體進行任何合作的。這實際假定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兩難境地：不合作，社會革命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自己原來在工人、農民領域陣地已經喪失殆盡；如若合作，無政府主義最終將不再是無政府主義，正如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所預言的那樣，這種合作是無政府主義的「自殺」。這時的合作表現出兩種形式，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加入了國民黨來反對共產黨；另一種形式為勞動大學的建立。雖然這些合作遭到了一些純粹無政府主義者的激烈批評，但這時已經意味着無政府主義走向了分裂，隨着合作的失敗，無政府主義在近代史上作為一種思潮也走到了盡頭。

在對無政府主義的反思中，作者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價值問題，是不是因為無政府主義有一定的烏托邦性質，或者說從政治角度看無政府主義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就會對它的價值評判有所降低呢？在作者眼裏，這是一種對無政府主義的普遍誤解，無政府主義不是反對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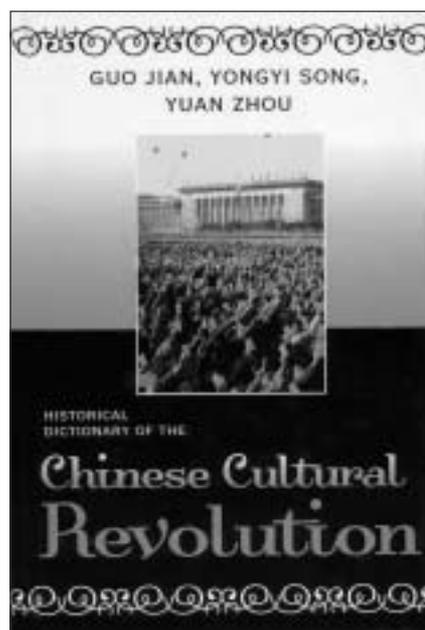
府，而是在本質上反對統治、批評霸權，假若把無政府主義與反政府等同起來，則是一種錯誤的簡單化行為。當然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有很多是帶有幻想性質的，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但除此之外，它的一些主張卻有深刻的歷史價值，包括它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激進文化的形成、革命話語的建立等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正如作者指出，不管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看

起來是多麼的幼稚，但他們可能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能意識到民主的複雜性。他們對中國革命話語的形成所做的貢獻，也表明了當時革命話語的複雜性。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雖然無政府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看來與政治無關，但是它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認識政治、反思政治的角度。這種角度對曲折的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而對今天我們研究思想史來說同樣十分重要。

## 研究文革的又一奠基石

● 徐友漁



Guo Jian, Yongyi Song, and Yuan Zhou,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由郭建、宋永毅、周原編寫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是繼《文化大革命文獻目錄，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中國文化大革命文